

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供给路径探索 ——基于“村超”“苏超”的比较研究

肖欣语¹ 孙灵彬¹

(1.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针对传统单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局限性, 以“村超”“苏超”为例, 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高质量合作供给路径。采用扎根理论与机器学习, 基于媒体平台 18688 条文本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分析, 并结合扎根理论进行理论建构。“村超”代表了情感驱动、自下而上的共同体建构路径, 公众情感反馈更积极; “苏超”代表了行政与市场驱动、自上而下的区域联动路径, 通过整合理论框架研究, 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 合作供给; 村超; 苏超; 扎根理论; 文本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80

一、引言

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新需求。这一变革对以政府为单一供给主体、自上而下运行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构成了新挑战。而传统模式因其内容同质化、运行效率有限等局限, 可能常导致服务与民众真实需求脱节。为此, 突破单一主体依赖, 构建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合作供给新模式, 已成为理论与实践界的普遍共识与改革方向。

然而, 合作供给的生成路径、运行逻辑、实现机制以及不同语境下的异质性问题仍缺乏系统性梳理与类型化比较。贵州“村超”与江苏“苏超”两个现象级文化实践为深入剖析合作供给的现实样态提供了分析样本。两者均以体育赛事为载体, 迅速超越赛事本身, 演化为集文化展演、社区凝聚与经济助推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事件, 但背后的资源动员方式与主体互动模式却呈现出鲜明差异, 映射出两种迥异的生成路径, 具有较高比较研究价值。

为了探析两种路径的内在机理, 本文首先运用机器学习对 18,688 条社交媒体文本数据进行分析, 以呈现两种现象在公众话语中的反响差异与主题分布。随后,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 建构能够解释两者路径差异的理论框架。本文旨在归纳并比较两种代表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路径: 1. 以“村超”为代表的“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 2. 以“苏超”为代表的“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通过辨析不同路径的动力机制、主体角色与社会效应, 深化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认知, 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地设计和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合作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从单一供给到合作供给: 理论转向与实践共识

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要求审视并超越传统的供给模式。这一进程根植于对政府单一供给局限性的深刻反思。传统上由政府作为唯一供给者的模式, 因其固有的科层化与单一性, 日益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时常导致“供需失衡”或“供需错配”的困境^[1]。公共选择理论早已指出, 政府垄断易导致效率低下^[2], 而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相分离的理论^[3], 则为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理论共识推动了实践的转向, 即从单一行政供给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合作供给^[4]。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整合社会各方资源, 克服单一主体在信息、能力上的局限性, 从而更精准地回应公众需求^[5], 提升服务的“可及性”^[6]。这一转向在中国获得了政策与学界的广泛认同, 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供给体系被视为关键

作者简介: 肖欣语 (2004—), 女, 湖北襄阳人, 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网络与新媒体;

孙灵彬 (2003—), 女, 陕西安康人, 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所在^[7]。

（二）两条生成路径的理论分野

在合作供给的宏大框架下，实践中逐渐浮现出两条逻辑迥异的生成路径，它们分别拥有不同的理论根基，并直观地映射于“苏超”与“村超”的实践之中。

第一，“自上而下”的行政与市场驱动路径。该路径以行政逻辑为主导，其理论基石是新公共管理思潮^[8]与政策网络理论^[9]。NPM 倡导将市场导向的思维引入公共部门，推动政府角色从“划桨者”转变为“掌舵者”^{[8][10]}。在此理念下，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公私合作等方式构建供给市场，其运行机制则可通过政策网络理论得到解释，即政府凭借核心资源，在网络中扮演引导者与核心节点的角色^[9]。

这一路径在中国实践中多体现为“政府购买服务”^[11]和正式的“政社合作”项目^[12]。此类项目通常有明确的生命周期，政府在不同阶段扮演着谋划者、守护者和使能者等不同角色^[10]，并需进行系统的风险控制^[12]。“苏超”联赛便可视作此路径的典型样本，其由省级体育部门主导，联合市场力量进行专业化运营，以塑造区域品牌、促进体育消费为目标^[13]，鲜明地体现了政府“掌舵”与市场驱动的特征。然而，该路径也内含张力，即对效率的追求可能牺牲公平等公共价值，其工具性逻辑也未必能有效激发深层的情感认同^[8]。

第二，“自下而上”的社区与情感驱动路径。与行政驱动路径形成对照的，是一条植根于基层社会、以社群逻辑为核心的路径。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社会资本理论^[14]与多中心治理学说^[15]。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有效化解集体行动困境，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14]。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激活基层活力、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资源^{[16][17]}。而多中心治理理论则为这种社群自组织提供了制度可行性，指出用户群体能够通过自组织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和可持续治理^[15]。

中国的“乡村春晚”^[18]、“乡村舞台”^[19]等实践，均是此路径的生动体现，它们依赖于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村民的自主参与。“村超”现象更是此路径的集中爆发，它并非源于顶层设计，而是发端于乡土社会深厚的足球热情与文化认同^[20]。其强大的社群凝聚力与组织动员力，正是本地社会资本厚积薄发的成果，完美诠释了社区如何能够不依赖外部强制，自发供给大型公共文化产品^[21]。

（三）合作治理与价值共创

为系统比较上述两条路径，需要整合性分析框架。合作治理理论^[22]为分析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模式提供了宽泛而严谨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共同生产^[23]或称价值共创^[18]理论，则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透镜。该理论强调，公民不再是服务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合作生产者^[23]。其参与层次可从被动的“执行者”，到主动的“合作者”，乃至根本的“发起者”^[24]。运用此框架审视：在以“苏超”为代表的“自上而下”路径中，公众更多被定位为“文化消费者”或“共同执行者”；而在以“村超”为代表的“自下而上”路径中，公众则体现为文化“发起者”与核心“生产者”的角色，实现了从服务提升到主体建构，再到乡村社会重构的深度价值共创^[18]。这揭示了两种路径在权力关系、价值导向和公众角色上的根本差异。

综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取得丰富成果。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其一，案例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因素或路径的组合效应，如多元参与和供需对接机制等^[24]，但缺乏对不同生成路径的系统性比较。其二，一个核心的现实张力尚未得到充分回应：即在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顶层设计下^[15]，如何与基层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社区自组织”实现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21]。

“村超”与“苏超”的并存，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比较样本。尽管已有研究对两者进行了解读，但尚无研究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严谨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剖析。本文旨在填补此项空白，以期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从单一的“行政主导”范式，向更加多元、包容、高效的“合作治理”范式转型。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研究的开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机器学习对大规模文本数据进行探索，其结果则为第二阶段的理论建构提供经验基础与分析起点。

第一阶段：量化文本探索。此阶段旨在对围绕“村超”与“苏超”产生的大规模社交媒体数据进行系统性内容挖掘。为量化两种现象引发的公众情感差异，本文采用基于 ERNIE 预训练模型的中文情感分析工具。该工具能够对每条文本进行分析，输出“积极”或“消极”的分类判断，并给出一个介于[0, 1]之间的连续情感倾向得分。本文将得分 > 0.65 的文本界定为积极情感，< 0.35 的界定为消极情感，中间为中性情感。此阈值设定参考了相关研究的普遍做法^[25]，并通过小规模人工校验确保了其在本文语料上的适用性。为探知公众讨论的核心议题，本文运用

(LDA) 主题模型, 通过计算主题一致性分数来确定最优主题数量, 确保模型可解释性与稳健性。为保证诠释的客观性, 每个主题的命名严格依据其下属的高频特征词进行归纳, 并由两位研究者交叉检验达成共识。为验证“村超”与“苏超”话语体系的独立性, 研究构建了一个逻辑回归文本分类器, 检验模型能否仅凭文本内容准确区分其讨论对象, 从而为两个案例的差异性提供证据。

第二阶段: 质性理论建构。此阶段旨在超越量化结果的表象, 向深层机制迈进, 其方法论基础为扎根理论, 并严格遵循程序化编码范式。本文采用计算扎根理论的思路, 即把第一阶段量化分析所识别出的高频词、情感倾向与核心主题, 作为第二阶段质性编码的初始“素材池”, 确保理论的生发始终植根于数据驱动的经验观察。整个编码过程严谨地划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开放性编码, 将文本数据进行解构, 赋予概念性的标签并聚合成初始范畴。其次是主轴性编码, 基于“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互动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 探寻范畴间的逻辑关联。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 提炼核心范畴, 并整合所有发现, 直至理论饱和。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微博、抖音、小红书三大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围绕“村超”、“贵州村超”、“苏超”、“江苏足球联赛”等关键词, 收集了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的相关帖子、评论和标题。原始数据经过清洗后最终获得两个数据集: “村超” (9,662 条) 与“苏超” (9,026 条)。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情感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量化数据客观呈现“村超”与“苏超”在社会舆论场域中所引发的反响差异, 并以此检验将两个现象作为不同分析单元进行比较研究的有效性。为此, 本文从情感极性与话语结构切入, 运用情感分析与机器学习分类模型, 为后续的机制剖析提供实证基础。

情感是公众对社会事件最直接的态度映射, 其整体倾向性与强度, 可有效衡量一个公共文化事件的社会共鸣水平。对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析后, 结果揭示出两者在公众情感反馈上存在显著差异: “村超”相关文本的平均情感得分为 0.6831, 显著高于“苏超”的 0.6122。

从情感分布的结构上看, “村超”的积极评论比例为 63.89%, 消极评论比例为 23.89%; 相比之下, “苏超”的积极评论比例为 55.35%, 消极评论比例则达到了 31.23%。这表明, “村超”在公众中不仅唤起了更为普遍的正面情绪, 也更有效地抑制了负面情绪的产生。这种情感反馈温差表明, 两者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员逻辑可能存在本质不同, 或可推断“村超”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公众更深层次的情感与价值认同。

表 1 情感分析结果对比

指标	“村超”	“苏超”	差值
平均情感得分	0.6831	0.6122	+0.0709
积极评论比例 (>0.6)	63.89%	55.35%	+8.54%
中性评论比例 (0.4-0.6)	12.22%	13.42%	-1.20%
消极评论比例 (<0.4)	23.89%	31.23%	-7.34%

在情感分析揭示了公众对两个事件在“态度与认知”层面存在差异之后, 本文进一步探究话语“内容”异质性, 以此回答“村超”与“苏超”是否已在公众讨论中演化为两个在语言风格、议题焦点与叙事框架上均被区分为独立话语体系。为此, 本文构建了一个逻辑回归文本分类模型。

该模型的任务是仅根据一段文本的内在特征, 判断其讨论的对象是“村超”还是“苏超”。模型的测试结果总体分类准确率达到 85.42%。这一较高的准确率表明, 两个事件在公众话语中已经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且独特的语言范式, 使得算法能够依据文本特征进行有效区分。在模型的预测中, 交叉误判的比例相对较低, 意味着, 公众在讨论“村超”时所使用的核心词汇、概念关联和叙事逻辑, 与讨论“苏超”时存在较明显的算法捕捉差异。这说明, “村超”与“苏超”并非同一性质事件在不同地域的简单复制或变体, 而是在社会互动中独立的文化现象。话语体系上的异质性为本文将二者作为两种不同合作供给路径进行比较分析, 提供了必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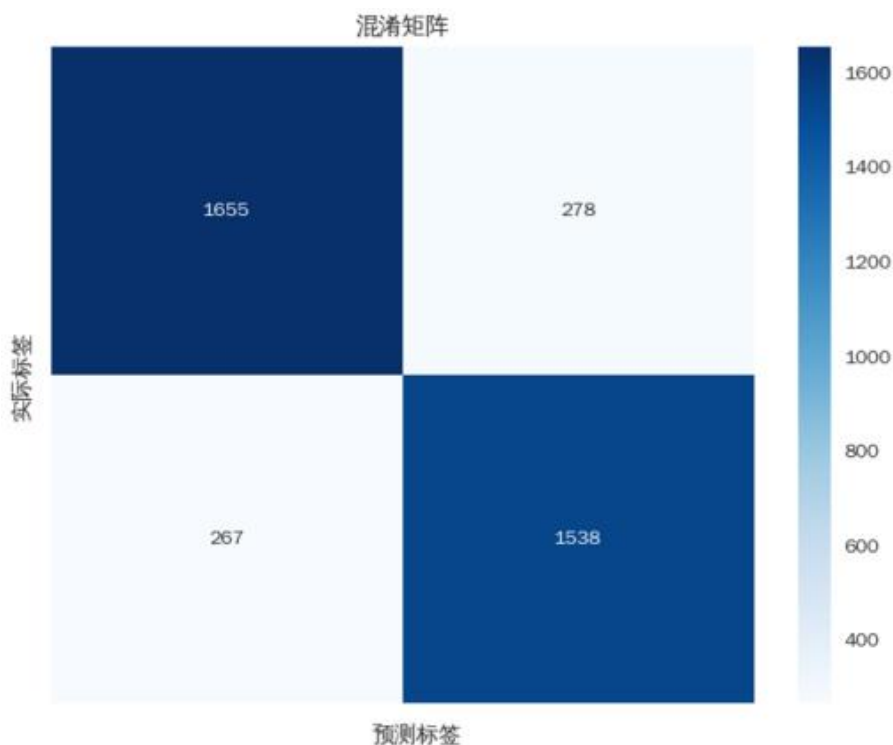


图1 文本分类混淆矩阵

(二) 主题建模

在确证“村超”与“苏超”的话语体系存在显著差异后, 本文进一步探究公众对于“村超”和“苏超”的讨论内容, 分析两种文化现象的内核差异。本文采用 LDA 主题建模探寻主题结构, 为确保生成主题的可解释性与模型的稳健性, 通过计算主题一致性分数来确定最优主题数量, 研究发现对于“村超”与“苏超”两个数据集, 当主题数设定为 8 时, 模型均能达到最高的一致性分数, 故后续分析均基于 8 个主题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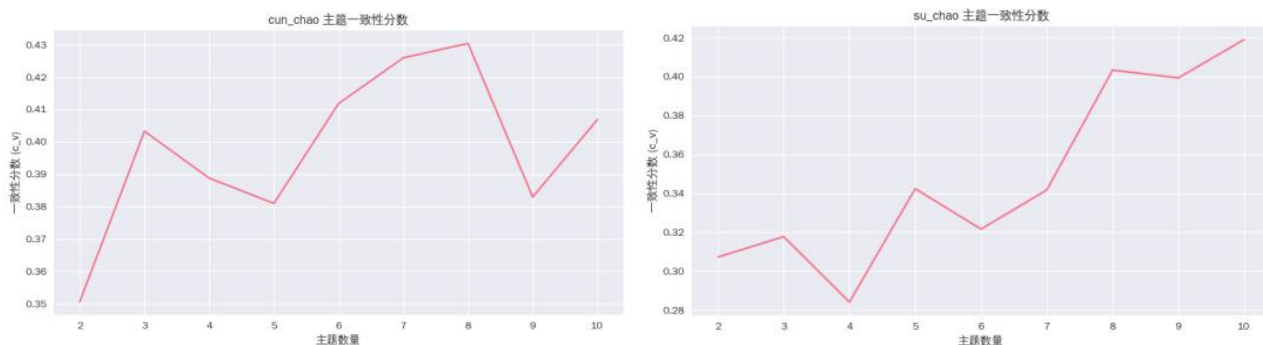


图2 主体一致性评分

对“村超”话语内容的分析结果表明, 其核心议题高度围绕地方情感、草根认同与集体主义叙事, 构建了以价值和情感为核心的意义世界。其中一个突出的元主题是“社区凝聚与地方认同”, 在相关讨论中, “榕江”与“贵州”等地名作为高频词反复出现, 并与“加油”、“家乡”等动员性词汇紧密相连, 表明该事件被公众深度嵌入到特定的地理空间与文化情境中, 成为激发地方自豪感、凝聚社区共识的强大载体。“纯粹足球与草根精神”构成了另一核心主题。公众话语频繁地将“村超”定位为对足球运动本真精神的回归, 强调其“热爱”、“纯粹”的草根底色, 并时常将其与备受争议的专业化足球体系(如“国足”)进行对比, 从而赋予其超越胜负的象征意义。此外, “家国情怀与灾害关怀”这一主题的出现也值得深思。公众的讨论并未局限于赛事本身, 而是与当时发生的“洪水”灾害产生了强烈的共情联动, 话语中充满了“致敬”、“子弟兵”等情感词汇, 使一场地方性体育赛事升华为承载民族情感的宏大叙事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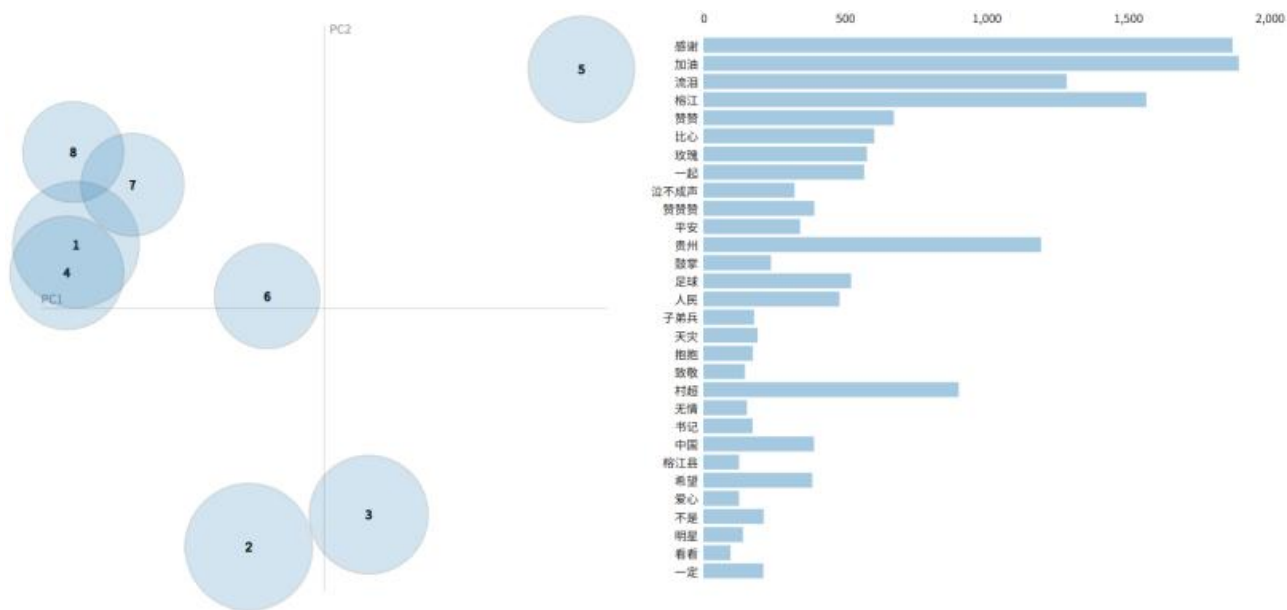


图3“村超”话题模型可视化结果截图

与“村超”相比，“苏超”的公众讨论呈现显著异质性。其核心议题更多地围绕城市竞争、市场化运作与竞技体育本身展开，整体上体现出更强的外生性与组织化特征。关于“苏超”的讨论中，尤为突出的是基于江苏省内城市单元的地域竞争。多个主题下的高频关键词均被“盐城”、“宿迁”、“南京”、“徐州”等城市名称所主导，并与“十三太保”这一网络流行语紧密关联。这表明该事件的动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城市为单位的、具有一定对抗性的地域认同之上。公众讨论的另一大焦点则集中于赛事的组织与文旅营销层面。在相关主题中，“文旅”、“江苏省”等词汇的频繁出现，暗示了其背后由行政力量主导、以促进文旅融合为目标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与“村超”的自发性叙事形成了鲜明对照。相较于“村超”对精神价值的侧重，“苏超”的讨论则更关注竞技本身与球迷文化。诸如“门将”、“守门员”等具体的赛事技术细节被更多地提及，表明公众及球迷群体对于比赛竞技水平和结果本身具有更高关注度。“苏超”的议题共同描绘出一个由行政规划与市场逻辑驱动、以地域竞争为主要动员方式的公共文化事件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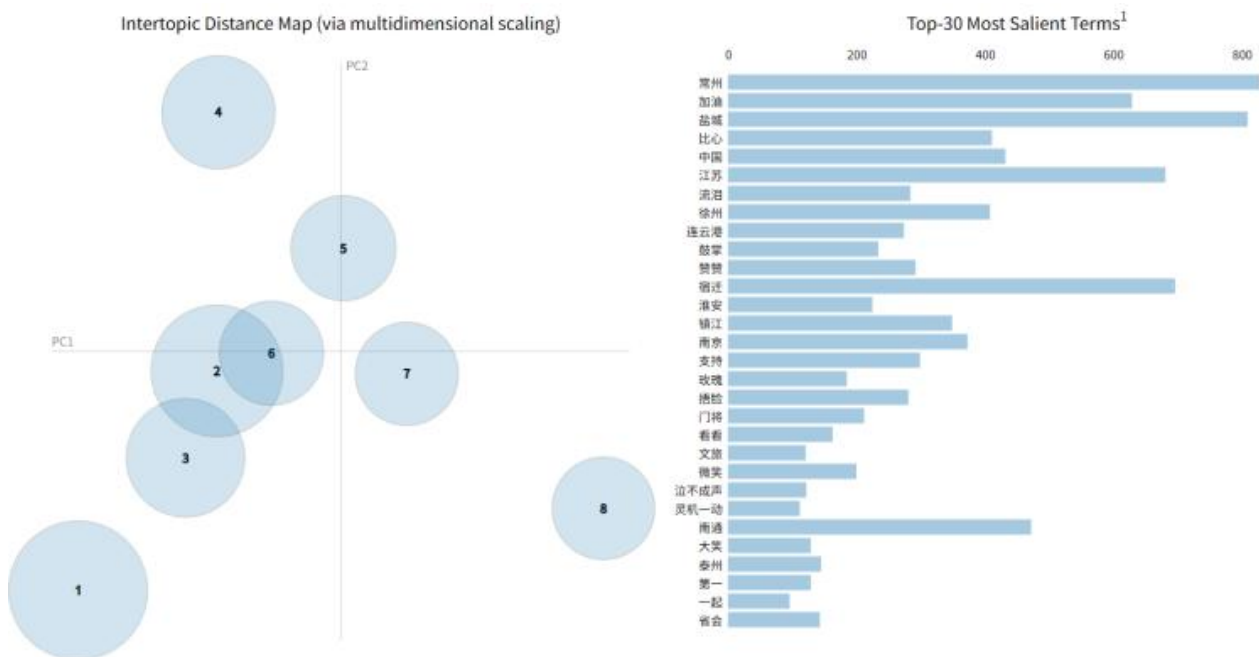


图4“苏超”话题模型可视化结果截图

(三) 主题建构

前文客观呈现了“村超”与“苏超”在公众话语中的宏观图景，本文继而进入理论建构环节，通过扎根理论构建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本文以此前的情感分析和主题建模结果作为“初始素材”，在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的基础上，通过主轴编码在离散范围间建立逻辑关联。研究遵循斯特劳斯与科尔宾^[26]的编码范式，建构出两条分析路径：一条路径再现了“村超”这一全民文化盛宴的内生性演化过程，而另一条则描绘了“苏超”这项规范化城市联赛的外生性建构过程。

表 2 主题建构

编码范式	“村超”故事线 (内生情感驱动)	“苏超”故事线 (外生市场逻辑)
现象	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	规范化的城市联赛
因果条件	长期被压抑的足球热情与深厚的乡土文化认同	提升城市活力与促进文旅融合由政府内在需求
脉络	贵州榕江经济欠发达但民风淳朴、社区关系紧密的社区环境	江苏省发达的经济基础与强烈的“散装江苏”式地域文化
中介条件	社交媒体的指数级传播与“洪水”等偶然事件激发的全国性同情	成熟的商业赞助体系与专业化的媒体宣传网络
互动策略	民众自发组织、政府顺势而为、媒体推波助澜的多方良性互动	省市体育局主导设计、市场化公司专业运营、各市球迷地域性响应
结果	形成了强大的社区凝聚力，提升了地方形象，并创造了现象级的文化品牌与“赛事经济”闭环	成功打造了一项区域性体育 IP，促进了城市间的品牌营销与体育消费

在主轴编码基础上，本文进入选择编码阶段，提炼核心范畴并形成整合性模型。经过系统归纳，本文确立的核心范畴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供给路径”，围绕这一核心，前述两条源于经验数据的“故事线”被进一步抽象形成了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理想类型。

第一种路径被概括为“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以“村超”为典型代表。其核心驱动力源自社区内部深植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情感。该路径通过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来激发共同体意识，自下而上地吸引和整合资源。在此过程中，公众并非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扮演着文化合作生产者与意义创造者的关键角色。

第二种路径则被概括为“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以“苏超”为代表。其核心驱动力来自外部的行政规划与市场激励。该路径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自上而下地进行资源配置与区域联动，公众则更多地是以文化消费者和城市支持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两种路径在动力来源、运行逻辑、公众角色和核心优势上均存在本质区别，共同构成了关于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的双路径比较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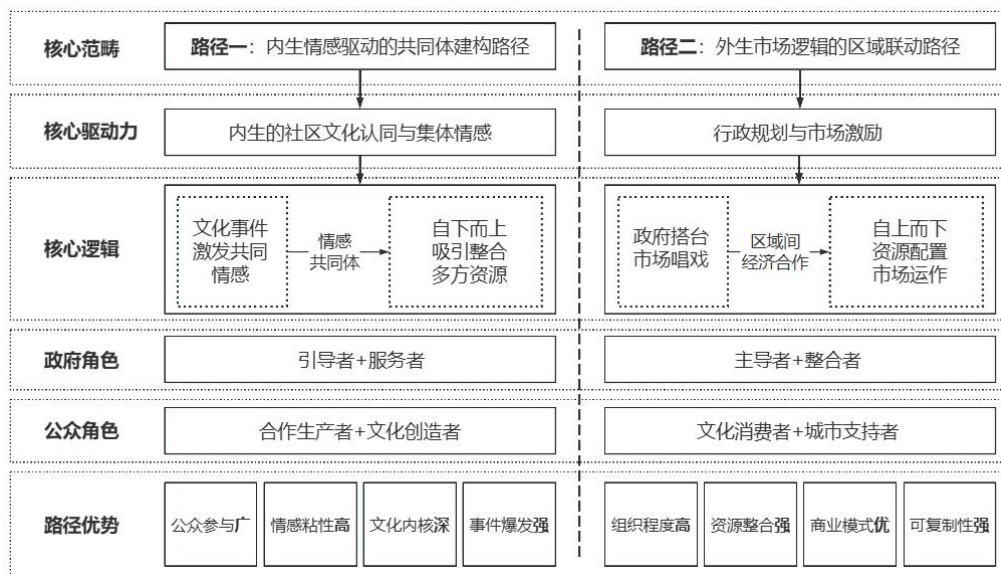


图 5 主轴建模结果

(四) 整合讨论

研究发现,“村超”之所以能在公众中激发出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其原因或可归结于其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该路径的起点是乡土社会中早已存在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情感,赛事本身作为一种催化剂,激活并放大了潜藏社会资本。公众的参与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对体育竞技本身的兴趣,而被视为一种表达社区归属感、捍卫家乡荣誉、重申传统文化价值的集体行动。因此,其所引发的情感,可被理解作为一种超越赛事本身的价值共鸣。

与之相对,“苏超”所遵循的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其动员机制更多地建立在由行政规划与市场激励所强化的地域认同和利益关联之上。公众的情感投入虽然也可能十分热烈,但其根源更多地指向对所属城市的直接支持、对区域竞争格局的关切以及对文旅消费体验的期待。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利益或地域认同的反应,其情感共鸣的性质与广度,可能与前述的价值共鸣有所区别。

为进一步确保理论饱和,本文进一步对主题模型与情感分析的结果进行了交叉验证。通过将每个主题下的文本平均情感得分进行计算与比较,两种路径在情感动员逻辑上的异质性得以清晰地数据化。结果显示,“村超”公众话语中情感评价最高的主题,均与超越赛事本身的宏大价值叙事紧密相关,如“感谢/平安/中国”和“玫瑰/爱心/希望”等主题,它们触及了公众对于家国情怀、人间温情与未来期盼等普适性价值的认同。“苏超”情感得分最高的主题则几乎完全被具体的地域标签所占据,如“盐城/滨海/观察”、“常州/南京/支持”等。这种鲜明的对比,为本文的核心论断——即“村超”的成功更侧重于价值共鸣,而“苏超”的动员更侧重于利益或地域认同——提供了有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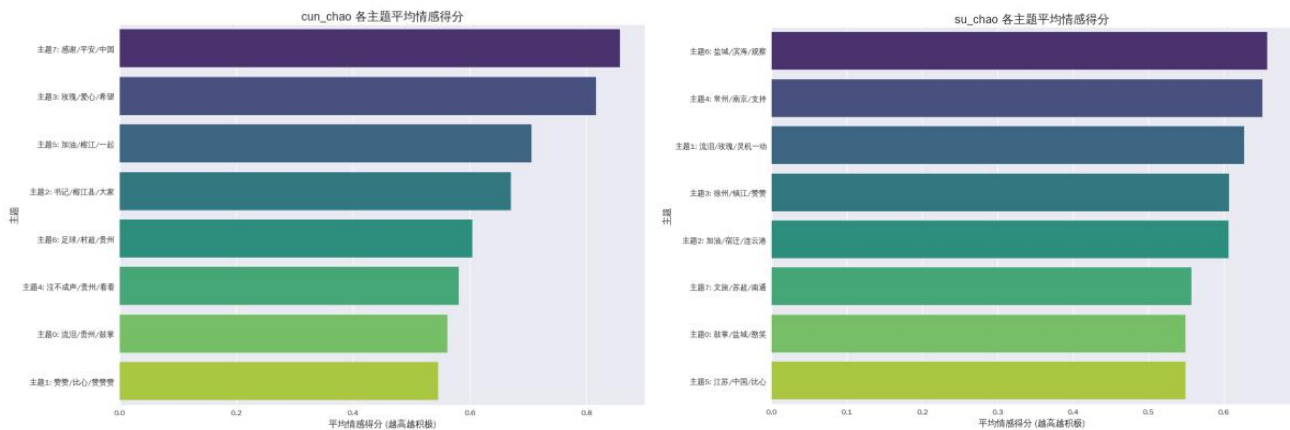


图6 “村超”与“苏超”各主题平均情感得分对比图

本文的发现对于深化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合作治理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虽强调多元主体协同的重要性,但其分析往往更侧重于制度安排、资源交换关系与契约化治理。本文则通过对“村超”路径的深入剖析,有力地证明了非正式要素在公共价值共创中的核心地位。研究发现,“集体情感”与“文化认同”不仅是社会资本的构成部分,更能在特定情境下转化为一种强大的非正式驱动资源,有效降低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激发基于信任的内聚力,其动员效率和情感深度是正式制度和契约关系难以企及的。其为社会资本理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依据,也说明在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理论的研究中,应给予情感、认同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同等的重视。

以“村超”为代表的内生路径,在其发展的后期,为谋求可持续性,不可避免地需要与政府的规范化引导和市场的商业化逻辑进行审慎的对接,这其中蕴含着“内生性”被“外生性”吸纳或改造的风险与机遇。反之,以“苏超”为代表的外生路径,若想提升其社会粘性与公共价值,也必须要有意识地培育内生的社群文化与情感联结,避免沦为纯粹的商业或行政展演。因此,两种路径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构成了未来值得持续追踪的重要问题。

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从单一政策工具应用,转向情境化的治理策略。政府的角色定位与干预方式应具备高度的适应性与差异性。在社会资本丰厚、内生动力强的地区,政府的适宜角色是赋能者与保障者。其政策重点应在于提供基础性的公共产品,如法律保障、设施支持,并致力于维护和激发基层社会的自主性与创造力,避免不当干预引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反之,在社群联结较弱、市场机制较成熟的地区,政府则可通过主动搭建合作平台、注入初始资源来启动供给进程。但此类干预的长期目标,应着眼于培育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与公民的有序参与,逐步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引导。经由这种依据地方条件动态调整的治理模式,方可更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从传统的行政主导范式,向更加多元、包容、高效的共识治理范式转型。

五、结论

“村超”与“苏超”并非同一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代表了当前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探索中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本文将其分别提炼为“内生情感驱动的共同体建构路径”与“外生市场逻辑的区域联动路径”。这两种路径在核心驱动力、运行逻辑、主体角色分配及社会效应上均存在本质差异。

“村超”路径的核心机制在于，以深植于乡土社会的文化认同与集体情感为原始驱动力，通过体育赛事这一载体，自下而上地激活了社区的内生动力与社会资本。在此路径中，公众不仅仅是服务的被动接受者，更是文化内容的合作生产者与意义创造者，政府则更多扮演了顺势而为的服务者与保障者角色。与之相对，“苏超”路径的生成逻辑则以行政力量的顶层设计和市场资本的激励为双引擎，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自上而下地进行资源整合与区域联动。该路径有效地利用了区域内的城市竞争关系与成熟的商业网络，公众在此过程中则更多以文化消费者和城市支持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两种路径在社会反响上亦存在显著差异。公众对“村超”模式的情感反馈远比“苏超”更为积极热烈。这也反映出“村超”的成功更依赖于触及广泛社会价值认同的价值共鸣，而“苏超”的动员则更多地建立在以城市为单位的利益或地域认同之上。

本文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构建了包含两种类型的分类框架。这一双路径模型不仅丰富和细化了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既有理论，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同时，研究突显了“集体情感”作为一种关键的、非正式的驱动资源，在特定情境下对于降低集体行动成本、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的核心作用，为社会资本理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研究表明了因地制宜、审慎选择合作供给路径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与文化机构应杜绝“一刀切”的模式照搬。对于拥有深厚乡土文化、社区认同感强的地区，可更多地借鉴“村超”模式；而对于经济发达、市场体系成熟的地区，“苏超”模式所代表的策略可能更具资源整合效率。这两种模式也揭示了价值并重、推动情感价值与市场价值良性互动的必要性。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社交媒体平台，其用户群体的代表性可能存在偏差。同时，作为一个基于特定时间窗口的横截面分析，本文对“村超”与“苏超”的长期影响与可持续性的探讨亦有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从两方面进行深化。其一，采用多方法验证，引入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多源数据的交叉验证。其二，进行纵贯性追踪，对两种模式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探究其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路径依赖、路径转化甚至路径融合的现象，从而更动态地揭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模式的演化规律。

参考文献:

- [1] 陈立元, 孙守强, 孙守义.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 图书与情报, 2024(1): 112-120.
- [2] BUCHANAN J M, TULLOCK G.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 [3]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贺芒, 邹芳, 范晓洁. “三圈理论”模型下公共文化服务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12): 88-98.
- [5] 金栋昌, 王宇富, 徐梦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OL]. 图书馆论坛: 1-13.
- [6] 钱兰岚, 王建涛. 服务“可及性”视角下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研究[J]. 图书馆杂志, 2022, 41(03): 41-47.
- [7] 孙捷.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 123-128.
- [8] HOOD C.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1, 69(1): 3-19.
- [9] RHODES R A W.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0] 李杨, 陆和建. 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与推进路径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24,(05): 96-105.
- [11] 赵晓雷. 政府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价值向度、现实样态与实践路径[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4,(11): 83-90.
- [12] 李祝启, 陆和建.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社合作供给和运营全流程风险控制研究——基于 PDCA 方法的分析[J]. 图书馆建设, 2022,(06): 137-147.

- [13] 王家宏. 体育赛事促进体育消费的效应评估与路径优化研究——以“苏超”联赛为例[J]. 体育科学, 2025, 45(1): 10-22.
- [14]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 [15] OSTROM E.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3): 641-672.
- [16] 杨志玲, 赵阳.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因素、路径与发展策略[J]. 河南社会科学, 2022, 30(12): 104-110.
- [17] 杨嫒, 黄雅奥, 王家合.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协同治理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 H 省 X 县的实证分析[J]. 图书馆, 2021,(06): 35-43.
- [18] 袁硕. 价值共创: 合作生产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春晚的案例研究[J]. 图书馆建设.
- [19] 李少惠, 崔吉磊. 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互动机理研究——以 Z 市“乡村舞台”建设为例[J]. 图书与情报, 2021,(02): 99-107.
- [20] 王宁. “村超”的文化意蕴与实践逻辑[J]. 文化纵横, 2023(4): 128-135.
- [21] 耿达, 卫雅琪.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文化自组织双向嵌入研究[J/OL]. 图书馆建设: 1-15.
- [22]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
- [23] 淳于森冷, 孟天广. 共同生产: 何以成为可能?——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9, 12(3): 83-107.
- [24] 李少惠, 邢磊.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 15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20,(21): 13-22+82.
- [25] 李冠, 孙灵芝, 何明祥. 生成式人工智能话题下公众认知的“关注度—满意度”量化分析——以微博平台为例[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4, 20(10): 9-21.
- [26]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Explo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Supply Path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Village Super League" and "Su Super League"

Xiao Xinyu¹, Sun Lingbin¹

¹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singl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model, taking "Village Super League" and "Su Super League" as examples, we explore a high-quality cooperative supply path involving multiple subjects. Using grounded theory and 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18688 text data of media platform,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grounded theory. "Village Super League" represents an emotion-driven, bottom-up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ath, and the public's emotional feedback is more positive; "Su Chao" represents the top-down regional linkage path driven by 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 By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ooperative supply; Murachao; Su Chao; Grounded theory; Text analysis